

中国

▲王小舒 王一民 陈广澧 著

现当代 传统诗词研究

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中国

王中忱 王一帆 编著

现当代 传统诗词研究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中国现当代传统诗词研究

王小舒 王一民 陈广澧 著

山东大学出版社

中国现当代传统诗词研究

王小舒 王一民 陈广澄著

责任编辑:邹宗良

内版设计:赵 岩

责任校对:一 良

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

地址: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

邮政编码:250100

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社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5.75 印张 149 千字

1997 年 7 月第 1 版

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 册

ISBN7—5607—1792—6/I·131

定价:9.00 元

目 录

目 录

第一章 中国现当代传统诗词创作概说	(1)
第二章 中国现当代传统诗词创作分述	(11)
一、承上启下的南社	(11)
二、勒马回缰的新文化运动健将	(22)
三、抒写心灵的文人诗词	(54)
四、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纵横诗坛	(104)
五、无名氏诗歌——民间的杰作	(124)
六、港台及海外华裔诗人	(128)
七、探索者的足迹	(139)
第三章 小结	(158)

第一章 中国现当代传统诗词创作概说

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。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。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以白话文作为通行全国的书面文字的举动，是我国文化史上一场意义非常重大的革命。

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曾经说过，一种主张是否正确，要用这种主张结出的果子来评判。他们认为，用白话写小说、写剧本、写教科书、写散文等，都不难结出果子；唯独诗词，不能用白话来代替文言文，看来是一个难以突破的壁垒。胡适在《逼上梁山》这篇论文中写道：“白话文学的作战，十仗之中，已胜了七八仗，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，还须用全力去抢夺。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，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是十足的了。所以我当时打定主意，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壁垒；就是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。”他们为了“征服”这一座最后的壁垒，一方面创作白话诗（新诗），另一方面便是

抨击旧体诗（传统诗词）。

清代旧体诗词的成就优越于元、明，这是文学史家们的共识。但当时旧体诗坛的创作也确实存在弊病。许多秀才、举人作诗还离不开帖括味，内容空泛；有些老诗人到了晚年爱写捧角诗、宴饮诗，格调不高；也有前清遗老自刊诗集，写的是购地筑园、念经拜佛。以上是内容上的毛病。在诗的风格上，有的墨守古法，尊唐摹宋，被人称作“假古董”；有的以险怪枯涩为工；有的追求异字僻典，让人看不懂，被人称做“江西魔派”。这种种弊病召来了许多合理的批评，即使到了今天，我们仍应引以为药石。

可是，从实际情况看，五四运动以后旧体诗词受到排斥，五四新文化运动给旧体诗词带来的消极影响是十分明显的。

“五四”以后，旧体诗词一时被视为应该被时代抛弃的文艺形式，当时许多著名文人都表示不写旧诗而改写新诗。若有写了新诗又再写几首旧诗的，就被批评为“走回头路”，是一种“反动”。有些著名的文学杂志，过去刊登过旧体诗词的也声明今后只刊新诗不刊旧体诗词。各学校的国文教材改称为国语教材，大大削减了传统诗词的教学内容。在南京，有一部分爱好传统诗词的青年出了一个《诗学专号》，所载的几乎全是旧体诗，便受到了一个大刊物的“极严正的攻击”。据说，“这场论争的结果便是扑灭了許多想做‘遗少’的青年人们的名士风流的幻想”，使许多原想学写旧体诗词的青年裹足不前。那时以写新诗为进步、写旧诗为落后的舆论占了绝对上风，于是新诗形成了垄断诗坛之势。

对旧体诗词创作消极影响的形成，是由于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：

一是对旧文学、旧体诗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。胡适对中国旧文学作过这样的论断：“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，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。死文字决不能产生出活文学，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。”（胡适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》）这段话不加分析地骂倒一切，自然是包括传统诗词在内的。他在谈到运动的作战方略时还说：“所以文学革命的作战方略，简单说来，只有‘用白话文作诗’一条是最基本的。这一条中心理论，有两个方面：一面要推倒旧文学，一面要建立白话为一切文学的工具。”（胡适《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》）这一段话，明白地表示了当初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是要用“白话作诗”，也就是用新诗来“推倒”传统诗词，是不让传统诗词在中国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。虽然他们的目标在日后的历史发展中并未能够达到，但是遗留下来的消极影响是不小的。

二是没有把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区别开来对待，因而有形式决定内容的倾向。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包含着两方面的任务，一是扫除封建主义文化，一是改革旧的文体。前者解决的对象是为封建主义服务的腐朽的、反动的文化，可以说是文的内容。后者解决的对象是语言、文字、文体本身，可以说是文的形式。这两项任务是密切关联的，但却并不是同一回事。不同的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。

为封建王朝歌功颂德、涂脂抹粉的文学，是应该骂倒、推倒的。对传播这种内容的诗歌形式、戏剧形式则不能采取骂倒、推倒的方法，只能采用继承其合理的部分、批评其落后的部分的方式，使其随时代而创新，为新时代服务。抱住旧形式不容改动分毫固然是错误的；不分青红皂白，把旧形式

与旧内容当做同一回事一起推倒，这同样也是错误的。

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曾经宣布，要“承认白话文学为正宗，这就是否认骈文、古文、律诗、古诗是正宗。这是推翻向来的正统，重新建立中国文学史上的正统”（胡适《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》）。律诗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一种成熟的诗歌形式，它的用韵与格律自可随时代转移而有所改革，但在当时被点名“废黜”，像宣统皇帝一样被宣布废黜，那就是你用这种形式不论写什么内容都不行，这种形式已经是绝对写不出好内容了。旧瓶装的绝对是坏酒，新瓶装的绝对是好酒，这岂不是陷入了形式决定内容的泥潭？郭沫若既写旧诗又写新诗，他在答复《诗刊》记者提问时说：“我很早就说过，形式不在乎新旧，主要是内容问题。用旧的形式装上新的内容，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新的东西。反过来，新形式装上旧东西，能说它是新的吗？”（《诗刊》1959年第1期刊文）

三是批评旧体诗的短处带有片面性。多种多样的诗歌样式是由无数诗人创造、经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形成的。各种诗歌样式都有各自的优长，也有各自的不足，这样才形成各自的个性，在祖国文艺的百花园中呈现众芳争艳的姿态。研究不同形式诗歌的作用时，应该相互吸收对方的长处来丰富自己，不能用自己的长处和特点来要求对方。即如诗、词、曲三种诗歌样式，可以互相借鉴，但却不能相互取代。白话诗（新诗）与其他诗歌的比较、切磋，也应该本着如此精神的。五四运动中，白话诗的创始者们批评旧体诗时，缺乏这样的精神。

试举一例，他们写了两句新诗，十个字：“他也许爱我——也许还爱我。”然后便问道：“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，可是旧

体诗能表达得出的吗？”（见胡适《建设理论集·谈新诗》）其他类似的论点还有：“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。”“二十八字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。”“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。”这些对旧体诗的批评都未免武断，但因为是出自名教授之口，确也使不少人对旧体诗词产生了模糊的认识。

臧克家比较过新旧诗体的短长；他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我觉得新诗在表达时代与现实生活方面，容量大、开拓力强，但失之散漫，不耐咀嚼。古典诗歌，精美含蕴，字少而味多。我老早就有这么一个想法：有些境界，用新诗写出来淡而无味，如果出之以旧体可能成为精品。”（《臧克家旧体诗稿自序》）接着他试举二三诗句作例说明，这里就不抄录了。

四是新文学运动中，缺乏像臧克家文章中所具有的平心静气作客观分析的学术空气。在争论问题中带有“悍”气，有不容讨论的味道，这是陈独秀、钱玄同、胡适都承认的。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，丝毫没有指责前贤更没有一点贬低他们的历史功绩的意思。平心而论，当时守旧派的顽固劲头不小，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们使用激烈的言辞也是可以理解的。然而在一场文学改革运动中，缺少客观分析的方法和平心静气的讨论，从而带来长期的消极后果，毕竟是令人遗憾的。

毛泽东在谈到五四运动时，首先肯定五四运动极大的功绩，同时也指出：“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。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，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，他们使用的方法，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，即形式主义的方法。他们反对旧八股、旧教条，主张科学和民主，是很对的。但是他

们对于现状，对于历史，对于外国事物，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，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，一切皆坏；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，一切皆好。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，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。”

以上讲的都是历史，历史已经过去。今天谈论历史只是为了总结经验，以利未来。传统诗词究竟有无存在的价值，有多大的生命力，今后如何继续向前发展，这些问题都要依靠传统诗词本身的创作实践来说明，依靠“五四”以后几十年的诗歌历史来说明。

经过“五四”强烈的冲击以后，从1919年到现在的七十多年间，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革，传统诗词自然也有它的发展变化。虽然历来无人提倡，知音者稀，备受诗坛的排斥，但是，它不但没有消亡，而且潜在的生命力仍然很强。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在《元明清诗鉴赏辞典·序言》中这样说：“从元代到清末的诗歌，确实在缓慢地朝着与五四文学接轨的方向前进”，“由于外来的影响而导致了新文学的提前出现，接轨并未接好”。这是说传统诗词一直是朝着前进方向演变的，却未能赶上五四新文学的快速步伐。回顾“五四”以来七十多年的历程，我们看到传统诗词的作者群确有不少杰出的有心人，自觉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辛苦耕耘开拓前进，做出了可喜的成绩。因此有必要耐心审视一下，这七十余年的传统诗词是如何地存在着，如何地发展变化着，从而让我们整理出一条发展的线索来。

首先是成立于1909年的南社在“五四”以后依然存在、依然活跃。1922年又成立了新南社。1920年，陈独秀、李大钊等23位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”的成员也成立了“亢慕义

斋”，开展诗词活动直到1927年。正是这期间，新文艺健将闻一多发出“勒马回缰作旧诗”的呼喊。相继成立诗社的还有：以夏敬观为中心的“午社”，以吴梅为中心的“如社”，以张伯驹为中心的“展春园诗社”等。

从1937年到1949年的八年抗日战争、三年解放战争期间，郭沫若的《战声集》、沈钧儒的《廖廖集》和《于右任诗存》出版了；陈毅的《横槊集》、夏承焘的《瞿禅诗稿》、朱自清的《犹贤博奕斋诗钞》、刘永济的《诵帚庵词集》、汪东的《梦秋词》成稿了。各地新成立的诗社，有湖南的“五溪诗社”、南京的《同声词刊》、北京的“延秋诗社”、天津的“玉润词社”。还有在陕甘宁边区成立的“怀安诗社”、苏北盐城成立的“湖海诗社”、晋察冀边区成立的“燕赵诗社”。

这一阶段国家民族都在战火中煎熬，一方面民不聊生，哀鸿遍野；另一方面战争的烈火锻炼了人。传统诗歌此刻更富有民族精神和生活气息，其共同特点是时代赋予的。正如周扬在《中国文学·发展概况》中所说：“作品都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。”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家和民族开始了一个新纪元，万事万物欣欣向荣。1957年1月《诗刊》创刊号首次公开发表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的18首诗词，这些诗词精练雄浑、大气磅礴，既铿锵美听，又易懂好记，一时风靡全国。这是“五四”以后传统诗词第一次获得公开普及，自然，传统诗词的声誉随之一振。郭沫若就曾这样说：“毛主席的诗词发表后，我对旧诗的看法改变了。如果从形式上去讨论新旧，说毛主席的诗词是旧的，而徐志摩、胡适的诗反而是新诗，那只有天晓得。”（吴奔星、徐放鸣编《沫若诗话》）吴奔星在《沫若

诗话》的代序中说：“郭沫若是五四时期写新诗并否定一切旧形式的人，大概到了四十年代中期，毛主席到重庆谈判，发表《沁园春·雪》之后，他才公开发表旧诗”，“解放后，他虽还写一些新诗，但在数量上却远远不如旧诗那样多”。臧克家在他的旧体诗稿自序中说：“五四以后传统诗词一直处在挨批受压的状况，几乎在诗坛上销声匿迹。由于五十年代，以毛泽东为首的老革命家卓有成就的传统诗词作品相继问世，轰动文坛，从此风气为之转变，传统诗词作者才得以挺直腰杆站立起来。”可见当时毛泽东诗词的影响之大。于是，《毛泽东诗词》、《朱德诗选集》、《邓散木诗选》、叶圣陶《篋存集》相继问世，黄炎培的《红桑集》、俞平伯的《古槐书屋词》也在香港出版。这就形成了“五四”低谷以来一个诗词活跃的高峰。

然而，五四运动对传统诗词的消极影响并未因此而消失。毛泽东在《诗刊》第一期载文说：“旧诗可以写一些，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。”这未尝不是“五四”影响的表现。何况，同年又有反右运动的突起，使这一良好的发展势头受到抑制而趋于冷落。十分令人惊奇的是，反右和以后的“文革”倒使一批本不做旧诗的人拿起了笔，造就了不少“牛棚”诗人，这些诗于“文革”以后纷纷问世。这些偷写成的诗均出自肺腑，绝无虚言，其中最受推崇的要算聂绀弩的《散宜生诗》，被胡乔木称为“诗坛的奇花”，它为传统诗词的创新做出了贡献。

“五四”以来诗词创作的第二个高峰应归于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。据从保留下来的《天安门诗文选》统计，传统诗词作品占60%以上，据另一诗钞统计竟占到作品总数的

88%。作者是广大的群众，他们通过诗歌形式表达出全国人民最强烈的爱和恨，表达出人们心中最真挚最深刻的感情。这些诗词短小精悍、朴实鲜明，既深沉又泼辣，既含蓄又犀利，具有很强的战斗性。“这千百篇革命诗文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，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珍品！”（《革命诗钞·前言》）当时“四人帮”尽管对这些诗加上“反动”的帽子，对作者进行疯狂的迫害，但仍被广为传抄，不胫而走。传抄者不惜冒巨大的风险，千方百计保存这些诗。如果说“五四”以来传统诗词的第一个高峰是普及和振起的话，那么第二个高峰便是它的能量的大释放。

在这个史无前例的群众自发性诗歌运动影响下，各地诗词社的建立呈风起云涌之势，而作者水平参差不齐。文坛对此褒贬不一，议论纷起也是很自然的事。天安门诗歌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，政治是第一位的，无须去评论其艺术水平。各地诗社的作者自然是另一回事，不能依样仿效。不过，这一现象不是人为使然，上面不提倡，下面不鼓动，纯属群众爱好。面对传统文化的勃然兴起，一味嗤之以鼻无济于事，也是很不应该的。正可因势利导，普及提高双管齐下，使我诗国之文化瑰宝重放光彩于今日！

后面，将“五四”以来的传统诗词择其有代表性的，稍加整理提供给读者。为了叙述方便，我们把它分成七个题目，依历史时期与不同的类型交叉排列：

- 一、承上启下的南社
- 二、勒马回缰的新文化运动健将
- 三、抒写心灵的文人诗词
- 四、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纵横诗坛

五、无名氏诗歌——民间的杰作

六、港台及海外华裔诗人

七、探索者的足迹

第二章 中国现当代传统诗词创作分述

一、承上启下的南社

南社是我国近代第一个革命的文学团体，它诞生于“五四”之前，资产阶级革命兴起，同盟会成立之际。正式成立在1909年11月13日，活动中心在上海。第一次雅集于苏州虎丘，当时社员17人，其中14人是同盟会会员。创始人陈去病、高旭和柳亚子都是同盟会会员。“之所以称南社，就有反抗北廷的意思。”（王昆仑语）他们提倡民族气节，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险，反对清廷的种族压迫和专制统治，鼓吹革命以挽救危亡。辛亥革命前社员二百余人，辛亥革命后，猛增到一千一百八十余人，这是南社的全盛时期。1910年开始出版的《南社》，分文录、诗录、词录三个部分。到1923年止共出版了22集。南社解体后，又有新南社和南社湘集、闽

集，前后延续三十余年。在推翻满清王朝的斗争中，淮南社的发起人周实、阮实等，被清廷县令杀害。在反袁斗争中，南社社员牺牲的，还有宋教仁、宁调远等九人。南社收集他们的诗文稿，专为他们立传。历史风云使作为诗社的南社，在文坛上放出耀眼的光辉。

我们说南社承上启下，是从政治上看的。他们要求彻底推翻满清政府，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。而从文学主张看，南社建立时，国粹主义思潮正流行于文坛，南社作家多数成员思想比较保守，要求发扬民族文化，但拒绝吸收外来文化，笼统地号召保存国学。还有不少社员成为白话运动的反对者，他们在文学上的奋斗目标甚至不如清末改良派。然而，它的另部分成员，以柳亚子为首的少数人则倾向进步。内部斗争激烈，于是南社分化成两派。后来的新南社勇敢支持新文化运动，柳亚子是它杰出的代表人物。

以柳亚子为首的南社诗人大力提倡“唐音”和“布衣之诗”，对当时的“宋诗派”的堕落丑态作尖锐的批判嘲笑，他们的观点集中反映在《胡寄尘诗序》中。柳亚子写道：“盖自一、二罢官废吏，身见放逐，利禄之怀耿耿勿忘。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，附庸风雅，造为艰深，以文浅陋。”柳亚子有《论诗六绝句》，讽王闿运有句云：“古色斑斓真意少，吾先无取是王翁。”他批判“同光体”是“魔诗”，有诗云：“郑陈枯寂无生趣，樊易淫哇乱正声，一笑嗣宗广武语，而今竖子尽成名。”南社继承的是龚自珍、谭嗣同以来变革进步的传统，柳亚子更提出“尤重布衣之诗，以为不事王侯，高尚其志，非肉食者所敢望”（《胡寄尘诗序》），南社诗人们提倡“一人有一人之诗，一时有一时之诗，一境有一境之诗。有真性情之